



武林蹤橫

陳季衡 王繼鈺 編

瀘州市傳統體育叢書編委會

泸州市传统体育丛书编委会

主任委员	刘育仁		
副主任委员	金灼麟	程广丽	向国绫
	周朝富	陈乃昆	吴庭发
委员	童恩正	董时恒	康超金
	陈清桂	周明理	卓成仁
	陈季衡	王继钰	李贯红
	毛子安	赵永康	刘启柏

前 言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西周有“拳勇”、“技击”、“相搏”的文字记载和西汉出现“武艺”一词以来，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它在广袤的国土上形成和繁衍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和拳种，武术水平不断得到充实提高，有些功夫确实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历史上，它在强民卫国、抗御外寇、扶正祛邪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历来被中华民族视为“国术”、“国宝”、“国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大力提倡武术，特别是列为亚运会竞赛项目，使这个民族文化的“瑰宝”——武术事业蓬勃发展。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城乡又掀起了一股“武术热”。人们谈武、教武、练武，武术成了热门。全国和各地相继成立了武术协会，并多次开展了全国和国际性的武术活动。武术培训班、武术学校、武术馆（站）应运而生。一些中小学也开设了武术课。在一些城市的公园广场、街头巷尾，随时可见习武者的身影。参加习武活动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它的影响不仅波及全国，而且波及全球。这对武术事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推动。

在武术事业发展盛况空前的形势下，我们编写这本

《武术纵横》，其目的是想为热心武术事业的人们提供一些研究学习的材料；帮助人们了解一些历史上武术在抗击侵略，反对压迫，保境安民，为国争光，为民吐气以及强身健体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什么是中华武术的固有特点；武术的“技击性”和“健身性”、“表演性”（娱乐性）的关系；以及注重崇尚“武德”等方面的情况。从而更加激励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宏扬民族正气，珍惜和正确对待这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处理好继承和创新，保留和扬弃，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更好地促进武术事业健康发展。

武术发源于人类谋求生存的狩猎、防身活动，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发展，一开始它就具有强烈的技击性。离开了“技击”，就无从谈论武术。在现代化武器高度发展的今天，武术仍不失其战斗作用。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将失去武术的传统优势，在武术技击方面就将落后于别人，就难免“花拳绣腿”之讥。

武术的“娱乐性”（或表演艺术）自古有之。前人把武术作为一项娱乐活动，不仅因为武术活动本身有很强的娱乐性，比如“摔跤”、“角抵”、舞弄刀、剑、棍棒等各种器械，和各种套路、散打拳击，都具有进退疾徐、跳跃柔韧、强劲刚毅、快速多变等艺术观赏价值，更主要的是“寓兵于乐”，把武术锻炼与文娱活动结合起来，使其得到更加普遍地开展，并非为乐而乐，为表演而表演。“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并不是为项羽、刘邦“佐酒”“助兴”。如果丢了武术的技击，而去单纯追求娱乐、表演艺术，那就是舍本求末了。再说武术之所以具有娱乐和表演性，正是因为它在攻防变化当中，既有手眼身法步的形象美，更有体现这些形象

美的内涵神韵，这种内涵神韵就是武术的技击性。即所谓“神形兼备”、“内外合一”。如果没有这些，武术的表演性也就失去了魅力。舞蹈可以从武术中吸取营养，如果武术吸收过多的舞蹈动作，把“武”变成“舞”，那武术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武术的健身性也是这样。它之所以能强身健体、益寿延年，正是因为它能够按照在多年实践中形成的拳法和器械的架势路数动作，长期坚持锻炼，并且注意形、神、意、气结合的结果。如果只重形式，不重内涵，或一曝十寒，动作不到位，也是难以收功的。健身是武术的整体功能，它贯穿于武术的始终，只知健身之妙，而忽视了技击之精神内合，是不全面的。我们说武术对健身有其它体育活动不可代替的特殊功能，就是指的这点。如果取消了武术的固有特点——技击性，那它就没有什么特殊功能可言了。

“武以德为先”。中华民族历来以武德培养人才。过去，严师授徒，立有门规，如有触犯，即按“家法”处治。要求习武者，匡扶正义，除暴安良，绝不允许为虎作伥，充当恶势力的鹰犬，残害人民；也不允许好勇斗狠，恃强凌弱，加害无辜。今天我们的武术工作，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武术的宣传上，有的为了迎合人们中的好奇心理，任意虚构假设，把有些功夫描绘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不合情理，不讲科学，渗杂迷信色彩；有的为了提高自己的“正宗”地位，借荫古人，影响武林同道之间的团结。有的习武，目的不甚明瞭，为了争强斗狠，刚学几招，就到处提劲打把，显示个人“英雄”本色；有的讲

究“哥们义气”，不是去恶扬善，而是“助纣为虐”，有的打着传授武艺的旗号，骗人钱财；有的打着“打富济贫”的招牌，扰乱社会治安；有的充当私人“保镖”，伤害群众……这些虽是极其个别现象，但应引起高度重视。不消除这些错误的东西，武术事业就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武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如打仗用的枪和炮一样，好人掌握了它，就干好事；坏人掌握了它，就干坏事。我们不能不慎重对待。

《武术纵横》以社会历史发展为线索，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正气为主导思想，串连各个时期的一些少见经传的武林故事，集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是一本凡具初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阅读的通俗读物。其所选材料，力求真实。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有益启示，使这本书能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编者

一九九一年四月一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斗禽兽萌生武术 伐蚩尤始有战争	(1)
第二章 立君主分封列国 相侵伐习武练兵	(10)
第三章 固统治选拔人才 开科举途分文武	(25)
第四章 卫国保家名标青史 民间习武各派扬威	(37)
第五章 国势日衰洋人入寇 百姓受侮壮士挥戈	(49)
第六章 订条约丧权辱国 抗外寇敌忾同仇	(63)
第七章 强民卫国人人有责 巾帼英豪不让须眉	(91)
第八章 将军耀武原是少林弟子 文士风流并非懦弱 书生	(109)
第九章 周恩来认真练习武术 胡志明曾拜中国拳师	(133)
第十章 武林传绝技 德行最为先	(144)
第十一章 神州大地百花齐放 民族技击异彩纷呈	(165)
第十二章 弘扬民族文化 走向世界殿堂	(184)
编后记	(190)

第一章：斗禽兽萌生武术 伐蚩尤始有战争

词曰：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读史·贺新郎》）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莽莽林海，茫茫沼泽。莽莽林海中隐藏着凶禽猛兽，茫茫沼泽里潜伏着毒蛇恶蛟。原始人类就生活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创造出人类特有之文化。那时，“人民少而禽兽众”，凶猛的禽兽，对人类的生存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经常出现“鸱乌攫老弱，野兽食颛民”。（《韩非子·五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几个人几十个人结成一个原始人群，依靠群体力量，抵御自然界的灾害和禽兽袭击。在斗争中，力气大，勇武过人的人，自然会受

到大家的尊敬和仰慕。

那时的人类，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穴居野处”，“日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篇》）除了御防禽兽袭击外，主要靠采集和狩猎获取食物，维持生活，得以繁衍。

狩猎，是人们为了生存繁衍所必须的活动。一个猎手同时也是战士；战斗的武器也就是狩猎的武器。严酷的生活环境，迫使人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们在同野兽的斗争中，在狩猎、采集等劳动过程中发展徒手或手持简单武器的攻防格斗技能。如拳打、脚踢、躲闪、跳跃、摔跤等，这就是拳术的萌芽。后来借用石器、木棒、骨器等作为工具和武器，在搏斗中出现了劈、砍、刺、掷等动作，这又是武术长、短器械使用方法的萌芽。由此可见，武术起源于生产活动，是在人类同大自然的斗争中诞生的，一开始就有强烈的战斗性，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

据考古资料证明，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我们祖国境内就有了人类。大约四、五十万年前，居住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山洞里的北京人，已能制造和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打制石器和木棒，用以狩猎和采集。学术界把这种使用粗糙打制石器时代，叫做旧石器时代。武术界人士从北京人使用的木器和石制的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的形状和功能推测，可能就是后来刀、斧、矛、戈等武术器械的“始祖”。经过漫长的岁月，北京人学会了用火，懂得用投枪、陷阱狩猎。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北京山顶洞人使用的劳动工具有了显著改进。开始采取磨制和钻孔技术制造石器、骨器、木器，还使用了弓箭。当然，那时的弓箭只是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易经·系辞》）还没有铜铁箭镞，但却为以后的良弓硬弩奠定了基础。那时居住在汾河沿岸的丁村人，还制造了石球。以藤索套上石球而作成“飞石索”，狩猎时将它抛出去，既可打击野兽，又可缠住野兽四肢。这种“飞石索”，就是后来“流星锤”的雏形。武术器械中的“绳镖”，同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石鱼镖、骨鱼叉相似，使用时都是在叉（镖）尾端系一根绳索，用手抓住绳索尾端，将镖、叉掷出去，然后牵动绳索将其收回。可见“绳镖”也是从原始的石鱼镖、骨鱼叉演变而来的。在原始社会，人类经常同野兽打交道，十分熟悉野兽的性能，他们为了加强自身的抗御能力，也摹仿野兽蹲、扑、跳、跃、腾、挪、曲缩等动作，编制出“百兽舞”，后来发展成“五禽戏”、象形拳，以至流传至今。那时人类使用拳术和器械，完全是出于谋求生存的本能动作，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手段。

根据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境内各民族为同一原始祖先的后裔。远古时期，人类过着游猎的流动生活，随着生齿的繁衍，为适应环境的变迁，乃不断分支迁徙，衍为多数支派。



一个猎手同时也是战士

各支派生存繁衍，因所处天然环境不同，影响其生活行动和文化发展，于是逐渐演进而为习俗不同、语言各异的各个民族。今天我们只要细心观察一下，国内各族人的体型、肤色、骨骼、面貌都大体相似，即可证明各民族的血缘，甚相接近。

依据已发现地层文化遗迹的分布情形和古籍传说记载，中国境内各民族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已由华北分向各地迁徙，至新石器时代已布满于中国各地。其中向中原内地迁徙的为夏族、夷族及黎苗族，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与长江各地区；夷族一部更远至辽东半岛及朝鲜北部沿海。其迁向东北方面的一支，在周时称肃慎或东胡，秦汉以后称乌桓、鲜卑、契丹、女真，为辽金及满族之祖先。其迁向北方的一支，大抵游牧于今陕西以北至蒙古之间，殷商时称土方，周初称玁狁，春秋时为北狄，秦汉时称匈奴，元以后称蒙古。其迁向西北与西南的一支称为氐羌族，分布于今陕、甘、青、藏及四川等地。在西北方面的，殷商时称羌，周秦时称西戎、犬戎，汉以后称铁勒、突厥、西夏等，其中一部为回族之祖先。在西南方面的，隋、唐时称土蕃，为今藏族的祖先。还有一支迁徙于长江流域以南各地，活动于东南沿海方面的，周时称为百越，后称东越、闽越；活动于西南方面的，周时称群蛮百濮，汉以后称西南夷，为今苗瑶等族之祖先。

以上各族自远古时代起，或因生活条件的压迫，或因内部的纷争，不断分支向各方迁徙，初因地域广大，彼此接触的机会少，遂各自形成独立部落和宗派，此为中华民族繁衍由合而分的情况，以后经各族长期繁衍，生口日多，辗转迁

移，接触的机会增多，战争与交往频繁，文化渐次融化，血缘互相交流，经过数十万年的长期发展，各民族又互相融化，走向由分而合，遂形成今日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久的中华民族。

距今约四五千年以前，到了氏族公社时代，已经有了农耕、畜牧和专门制石、制骨、制陶的手工业。随着生产的发展，各氏族部落之间，开始有了一些剩余财富。当一个部落的财物刺激另一部落的贪欲时，使用武力就成为掠夺财富的一种手段，因此便发生战争。“民物相攫而有武矣。”（《兵迹》）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炎帝）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号炎帝，亦曰阪泉氏，”神农（炎帝）是夏族集团首领，蚩尤是黎苗集团首领，蚩尤战胜炎帝而自为炎帝，这就关系到夏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于是激起了夏族集团内另一个氏族首领——黄帝起而反抗黎族蚩尤的侵略。“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史记·五帝本纪》）当时蚩尤率八十一个氏族，以金属为兵器，制成大刀矛戟，与黄帝在涿鹿（今河北涿县）地区进行决战。黄帝大获全胜，蚩尤被擒杀。

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为我国传说上最早的战争。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我国北部自黄河流域至于长江流域，已布满人类的活动。在此区内有夏族、夷族、黎苗族。夏族活动于黄河中游，今陕西、甘肃、山西之南部，河南西部；夷族活动于今河北省南部，山东省东部，江苏、安徽之北部；黎苗族活动于今河南省中部南部及湖北、湖南

等地。在中原之四周，北有晕粥、獫狁，西北有戎族、羌族。在此时期中，人民生活仍以畝猎游牧为主，而进入中原之各族，因河南平原之黄土层地质较松，逐渐进入浅耕农业时代，生活日趋丰裕，生齿亦渐繁殖，渐成定居之氏族社会。所谓氏族社会，就是依原始血缘之集团，成为一种生活集团的部落。而在此种氏族间，为争夺牧地耕地和猎获物资等，自不免发生争端，于是产生氏族间之共主作仲裁之宗主，这就是原始国家的雏形。管子君臣下篇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匹配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许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就是原始人类生活与氏族社会建立的情形。传说炎帝神农氏活动于夏族活动区域，当为夏族之共主；（国语卷十晋语载：“昔少典聚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有娇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少皞氏活动在夷族活动区域，当为夷族之共主；（左传卷四十八鲁昭公十七年传：“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到，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郯国即今山东郯城县。又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传：“少皞氏有四叔，世不失业，遂济穷桑。”穷桑即空桑，在鲁北，或云即今曲阜县。）蚩尤氏活动于黎苗活动区域，当为黎苗族之共主。（战国秦策注及经典释文吕刑高诱与马融均认为蚩尤为九黎之君。）夏、黎两族均处于今河南省中部。夏族由北而南，黎族由南而北，彼此竞逐于中原平原适于游牧畝猎之地，其

发生争端，自在意想之中。相积日久，遂演成两族团大规模战斗。蚩尤与炎帝榆罔之战，即由此发生，亦为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拉开了序幕。

蚩尤既以黎族八十一个氏族进攻炎帝，驱逐帝榆罔而自为炎帝以统治中原，威振天下。夏族各氏族不甘于异族统治，都起来反抗。这时黄帝毅然联合夏族各部落，展开对蚩尤的斗争。黄帝深知蚩尤部族人多势众，又使用铜兵器，力量强大，不易抵御，遂采取运动作战的策略，避其强锋，将其引导于一陌生环境，利用天时地形条件，增加蚩尤部众生活行动的困难，以削弱其势力，然后乘其陷于消极被动战力衰退之际，捕捉机会再予以歼灭性的打击。

根据推测，黄帝与蚩尤最初接战之地点，可能在河南省中部。接触后，黄帝即主动向北引退，蚩尤部族随即跟踪追击。蚩尤部族进入河北平原后，因环境生疏，气候不适，语言隔阂，敌情不明，以及没有后勤供应，缺乏饮食等因素，行动日感困难；且愈深入，环境愈陌生，伤亡损耗又无法补充，故精神上的威胁亦愈大。及进抵河北省北部地区后，蚩尤部族因长途奔驰，不但疲劳困顿完全陷于消极被动，且战力战志均大为衰退。反之，黄帝部族因得天时地形之利，可选择有利时机地点，主动予以反击，无形中实力相对增强。最后，黄帝于涿鹿一带地区捕捉一特殊有利天候——即狂风大作，尘沙蔽天，日月无光（华北地区常有暴风），蚩尤部族在陌生环境中，当此从未遭遇的景象，正处在惊恐彷徨之际，黄帝利用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部族冲击，遂一举将其击溃，蚩尤亦被捕杀。根据这一构想，黄帝早在五千多年以前，即创造了我国战史上诱敌深入，后退决战大获全

胜的典型战例。后来，孙子在其所著兵法《行军篇》中，阐述山谷、河川、斥泽、平原四者之战斗原则后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汉简《孙子兵法》佚文中记载：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曹操注：“黄帝始立，四方诸侯无不称帝，以此四地胜之也。”）可见战略主动之选择，与天时地形之利用，实为黄帝战胜蚩尤的重要因素。

涿鹿之战后，黄帝乘胜规复中原。因黄帝擒杀了“暴虐百姓”“威振天下”的蚩尤，声威大振，故得中原各部落的拥护，被诸侯尊为共主。黄帝更乘战胜之威，继续对四方进行征讨，“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据《史记·五帝本纪》上载：当时黄帝曾“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泰山），西至崆峒，登鸡头（崆峒、鸡头皆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南至于江，登熊、湘（熊山今湖南益阳县西熊耳山，湘山在岳阳县西南），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今察哈尔、涿鹿县西北）而邑于涿鹿之阿。”由此可见当时黄帝声威远播的情形。

据史记记载，黄帝在我国古代史上为五帝之首，亦为夏禹以前势力最大的共主。但当时无所谓中央政治组织，其对于各部落的统属，仅有所谓“设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史记·五帝本纪》）此种“监于万国”的左右大监，当系黄帝于众多氏族领袖中，选择一、二有勋勋而又有实力者作为众氏族的裁判人。史学界认为，此种制度，似即以后四岳制度与方伯制度之滥觞。

此时，农耕畜牧尚在开始，陶器制作正在发展，人民生活尚停留在极简单阶段。黄帝除教民耕种、畜牧外，更制衣

裳，（风俗通空霸篇载：“黄帝始制衣冠，垂衣裳……”，作宫室，（白虎通载：“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发明舟车，（易系辞传称：“黄帝尧舜……剡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创造文字、弓矢，（拾遗记载：“轩辕始造书契。”易系辞传谓：“黄帝尧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占日月，作调历（史记历书索隐引世本曰：

“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衷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六律而成调历。”）等从事各种发明创造，以发展文化改进生活。由此可见，将人类由原始野蛮生活进入文明时代生活实自黄帝开始。当时黄帝创造的各种文化，超越群辈，光耀海宇，使四邻各族闻风响慕，实为尔后东亚各民族逐渐同化为中华民族之基础。所以涿鹿之战与以后黄帝各种文化创造，乃为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亦为东亚文化史上一件绝大之事。正是：中华民族源一宗，弟兄迁徙各西东；历尽沧桑成一统，同沐轩辕造化功。

第二章 立君主分封列国 相侵伐习武练兵

诗曰：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邱；争名夺利几时休？良善必胜丑陋。

人类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由合而分，由分而合，从原始人群，逐步发展成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组织。经过战争兼并和文化融合，部落联盟逐步发展成国家。而这些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的首领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占有剩余产品供私人享用，并把战争俘虏作为奴隶，强迫他们劳动并强占其劳动成果。一般氏族成员也被迫成为平民或奴隶，富有的氏族首领成了贵族。于是奴隶和奴隶主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形成，我国的原始社会走到了尽头，开始进入奴隶社会。

在距今约4600年前，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后，又经历了尧舜时期，至公元前2205年，夏禹因治水有功进为中原之共主，建立夏代王朝，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夏禹在治水中，“亲操橐耜，而九亲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甚雨。”（《庄子·天下篇》）